

经济学家聚焦后“非典” 时期的经济形势

——研讨会综述

□ 民建中央调研部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肆虐一时的“非典”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在后“非典”时期，有机会让我们冷静下来，关心和思考一些问题，诸如：此次“非典”给我国国民经济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次突发事件留给我们哪些启示，当前和今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尽可能减少和弥补这些损失，以使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健康、快速发展。为此，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近日邀请在京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研讨“非典”与我国经济形势，以下是专家们的主要观点（按发言先后排序）。

林毅夫（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非典”疫情不出现反复，情况继续好转，疫情顺利消除，我估计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控制在1个百分点以内，我国仍有可能取得7%到8%的同比增长率。

疫情消除后，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更可以继续保持乐观。

主要的原因是：“非典”只感染到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受感染者可以治愈，全国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会有何损失，社会组织结构也没有受到影响。另外综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也不会减少。因此，“非典”疫情被控制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迅速回归到原来的长期趋势。

就控制“非典”的直接、间接不利影响方面，我想谈两点意见：

1. 对“非典”的反应，我国靠行政动员的优势，很快将“非典”的扩散抑制下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这套行政系统的力量一启动起来怎么刹车是一个问题。有必要权衡“非典”复发的危险和过渡防范可能付出的代价，采取适当的过渡措施使经济社会各项活动逐步恢复正常，整个社会的总体损失才能降到最低。

2. 这次“非典”疫情暴发，我国早期的发应迟滞，信息不透明，在国际社会上存着一定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像香港和多伦多政府那样雇请一些有经验的国际公关公司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以增强我国政府的形象。设法把不利影响

尽量降到最低，以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从“非典”疫情突发冲击中，应该吸取的不仅是抗击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的经验教训，而且，应该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抵抗各种风险，处理各类危机，减少不必要伤害的能力，实现把坏事变为好事目标。就此，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建立一个有法律依据、有权威的。能够迅速掌握准确信息、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制度化机制。

第二，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任何危机发生时，除了直接的当事人之外，受其负面影响最深的通常是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包括离退休职工、失业、待业人员。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有给与在危机事件中受到冲击的人群必要帮助的内容，以减低危机事件对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伤害。

第三，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要推动人民生活、卫生习惯的现代化。

第四，面对未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可能发生的金融或是其

他经济危机，健康的金融、经济体系是度过危机、降低伤害最重要的保证。

樊 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分析“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我想强调两个因素。一个是滞后影响。“非典”影响经济最基本的方式是减少人们的接触、交往以及交易等经济活动。现在的情况是在执行过去的订单，虽然有的产品订单还可能增加，但新产品、新客户等需要直接接触的交易明显减少。另外就是项目拖期，很多项目的审批都拖期了，这样影响的面很宽，而且拖延了两个月，滞后的影响以后会逐步显现。第二就是影响的全面性。因为“非典”影响人们的接触、活动，因此对任何一个部门都会产生影响，而且影响程度也不见得小。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一个百分点估计还是会有有的。但今年整个的情况还是不错的，8%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是从短期来讲。长期来讲，首先要思考体制问题，像预警系统、政府公开性、危机处理系统。对于我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建立公共卫生防御系统，传染病报警系统，使大家都重视起来，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二，危机防御系统最重要的机制就是信息传递机制。让信息赶快传递，让大家都知道，增大信息的供给，增加全民知识，也是危机应对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期该做的，就是把已有的知识做好宣传，让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得病，什么情况下不会得病，随着知识的丰富，逐步降低过度反映的程度，让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受的影响减低到最小程度。第三是非常时期机制。政府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宣布进入非常时期，动用必要的资源和法律手段，启动动员机制，但是要注意在适当的时间解除非常时期，恢复到正常情况。

魏 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我国一些地区今年3月初开始暴发的SARS疫情，虽然对所有经济活动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对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却是不同的。有的不能仅靠企业自身来解决，需要实行有效的产业保护政策。一般来说产业保护政策有三种：

第一种是一般性保护政策。指对有关产业的企业实行税费的减免政策，即有些产业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收入减少，无力对国家交纳应有的税费，国家通过租费减免而保护该产业。

第二种是中度性产业保护政策。指国家对有些产业的企业不仅仅减免税费，而且还对有些产业的企业进行收益性补贴。

第三种是深度性产业保护政策。指某些产业的企业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其收入不仅不能向社会提供税费，自身的投资收益也受损，而且连非工作性成本支

付都需要企业自身承担，而企业无力支付，这就要求国家对企业的非工作性成本支付进行补贴。

上述三种不同的产业保护政策，国家在实行时应有所选择。对于受损太大的有些产业的企业应分别实行中度性产业保护政策和深度性产业保护政策。

实行产业保护政策要求国家、企业及个人都应通过各种方式形成旨在维护产业利益的产业保护基金。产业保护基金应由国家、企业及就业者个人共同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应在财政支出中专项设立产业保护基金，逐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状况进行一定比例的扣除，不断形成资金积累，用于防范产业风险；企业也应该设立专项的防风险基金，以用于防范不测的风险；个人也应该自行设立自我风险保护基金，也就是将自己的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无有任何风险的投资中，例如进行银行储蓄，以便于防范不测事件的发生。总之，全社会都要参与自我保护，从而形成强大的防危机机制，以应对SARS之类的灾害。

董辅初(北京大学教授)

我认为，至今我们对“非典”给经济的影响的考虑是远不充分的。我们应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

(一)对需求的影响和对供给的影响。目前，人们大多只着眼“非典”对需求的影响，而对供给的影响则谈得少。实际上，需求与供给不可分，需求下降势必造成

供给下降。在考虑“非典”对需求的影响时，人们大多注意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而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的影响则考虑得少，甚至没有考虑。

(二) 可弥补的影响和不可弥补的影响。“非典”的影响有些是可以弥补的。例如，在“非典”猖獗的城市为避免“非典”的传染，把购房的消费需求推迟了。有些“非典”的影响则是不可弥补的，例如，人们不可能把“非典”流行期间减少到饭馆吃饭的消费补起来。房屋的销售推迟，造成房地产公司的资金积压，资金回收慢，成本增加，这些损失则是不可弥补的。

(三) 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非典”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容易看到，也容易计算，间接的影响则容易被忽视，而且难以计算。目前，人们在估计“非典”的影响时，大多只考虑直接的影响。实际上，间接的影响可能比直接的影响还要大。例如，会展业受“非典”的影响巨大。预定要在我国举办的女子世界杯足球赛等体育比赛被取消、移到他国举行，其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非经济方面的影响则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

(四) 负面的影响和正面的影响。“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无疑首先而且主要是负面的，但它确实也有正面的影响。例如，与医疗、保健有关的行业，获得了发展的机会。“非典”引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经济。我国的产业结构也会作

出调整，例如，人寿保险业将得到快速发展，环保产业更要发展。

(五) 有形的影响和无形的影响。“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有些是有形的，更多的影响是无形的。

(六) 当地的影响和扩散的影响。“非典”的影响固然发生于其流行的当地，但它的影响会广泛扩散。由于各地间的经济联系紧密，它的影响会随经济链条广泛扩散。

(七) 当前的影响和长远的影响。目前人们谈得多的是“非典”对当前经济的影响。其实，现在就要考虑它的长远的影响。作为一种传染病，在人类没有找到制服它的办法前，会反复发作，从而再次影响经济。

(八) “非典”给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广泛和深远，可谓人们从未经历过，而且对它的影响也还远未认识清楚，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陈 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我们一定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的自我平衡和自我补偿的能力比政府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非典”对全国经济确实有影响，但毕竟直接受到重创的是有限的几个省区、有限的几个产业。人们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上的消费结构是一定的。“非典”并没有破坏这个物质基础，人们不会就此不上饭馆。我们不要低估市场的力量，不要把政府当作救市和恢复经济的第一位的力量，所以我们不必太过担心。

特别要防止形成不良预期，即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今后的风险都交给政府算了。这个预期是不对的，不是市场经济下合理的预期。我们过去的风险意识太弱了，即使不出“非典”这种事，风险也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我们所有的主体都应当想办法通过市场化的渠道提高自己的安全存活度。因此更重要的是组织起市场化的安全系统，不只是预警系统、应急系统、卫生系统，而且要大力发展市场化的安全补偿系统。

在政策资源配置上，凡是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去管；凡是市场干的不太好的，政府少管一点；凡是市场完全管不了的，政府再去管。不能按谁损失大和小来确定补偿政策，如果这个产业有足够的市场化力量和竞争，政府就别管它。市场经济从来就是有牺牲的，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是人道主义的关系。政府不是慈善机构、不是保险公司。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4月中旬，在“非典”形势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中央提出把防治“非典”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5月中旬，“非典”形势有所缓解，中央又提出“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工作”；6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松劲，一手抓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不动摇。中央上述战略部署，十

分正确，非常及时。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我建议：

（一）在战略部署和政策取向上，宜从“两手抓”适时转变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非典”是暂时性、突发性事件，在一定时期强调防治“非典”的重要性，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宜在较长时期把防治“非典”和经济工作并重。建议适时地把“两手抓”转变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突出经济工作这个中心。

（二）各级政府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工作上来，确保今年7%的增长目标。要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设计、立项、论证、投资和实施，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把“非典”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三）要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对“非典”宣传力度。当前防治“非典”工作已取得显著成绩；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的工作需要长期地、经常地进行；媒体宣传重点宜适时地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长期方针上来，加大对经济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的报导和研究力度。

（四）培育和鼓励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税收和信贷的支持力度。虽然有些地方房地产业投资增长过猛，高档住宅和别墅发展过快，要引起警惕；但不宜轻言“泡沫”。要进一步发展房地产和汽车的消费信贷，减免一些税费，发展二手房市场，刺激有效需求。

（五）发展劳动密集型公共投资，吸纳社会劳动力，缓解就业压

力。“非典”对劳动就业的实际影响和滞后影响相当严重。建议适当调整国家投资结构，增加劳动密集型公共投资，如修建公路、加固堤防、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增加农村修桥、修路。

（六）支持进出口贸易，切实解决出口退税拖欠问题。今年许多合同是去年签订的。“非典”对外贸、外资的滞后影响必须未雨绸缪。在扩大出口贸易中，切实解决出口退税拖欠问题刻不容缓。建议：（1）缩短出口退税的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六个月；（2）由税务机关承担出口退税帐户委托贷款利息，减少外贸企业负担；（3）试行应退税款证券化办法，即税务机关向企业开具应退税款金额和时限，由企业向金融机构贴现。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我同意“非典”对今年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的观点，估计在1个百分点左右，全年增长仍在7%以上，但中长期影响怎么样，还看不很准，我认为不能太乐观。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非典”造成的心理障碍不是短期能消除的，国外对中国产品的紧张情绪也不是能马上消除的。日本和韩国的居民已开始远离中国的农产品，而我国农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所以要有足够的估计，不光今年，要看到明年。

有必要在两个方面做好工作，一个是如何慢慢削减群众的紧张气氛，要避免过分的宣传对经济造

成的不良影响；另一个是如何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印象，“非典”初期的迟缓处理方式，对中国政府的声誉，对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均有一定的影响，怎么挽回值得思考。千万不要再搞形式主义的东西了，更不要“炒作”。“非典”初期的反应，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部分官员只关心自己、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和说假话、报喜不报忧的弊病。这次也是个契机，要求我们在提高透明度，在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方面，做扎实的工作，下大功夫。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对于经受“非典”冲击的我国经济形势，我简单谈几个观点。

第一、对经济影响分析我看有三个阶段：从“影响不大”到“影响不可低估”，再到“现在说不准”。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的时候受前四个月好形势的鼓舞，因此说没关系的多，后来发现“非典”影响到了一些行业，一部分行业的经济增长明显出现下降，北京发展速度明显下降了，所以又说影响不可低估，现在的情况短期来看很难讲准确了。

第二、从“非典”对经济影响的几个特点看未来的影响力度。“非典”传播有两个特性：一个是不接触性。导致了人们不接触的交流，比如学校开设空中课堂，单位举行电话或者视频会议等；再一个是不确定性。“非典”的传播

渠道始终没有破解，解药没有问世，出现反复的威胁很大。由此带来对经济影响的三个特性：其一、“渗透效应大”，所有行业都出现了“非典”成本和风险问题；其二、“放大效应强”，甚至把应急做法变成正常工作的误解，这是可能是高估非典影响的原因之一；其三、“差别性反应大”，有直接损伤、间接受害，利害均有，如旅游业受到重创；餐饮、零售业骤冷；交通运输业如航空、铁路、出租车等受较大影响，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活动出现一定障碍；还有部分获利的行业和企业，通讯和信息产业、健康产业、教育文化等。

第三、应对“非典”影响的若干建议：一是针对不确定性要增加制度创新力度，建立非传统安全体系，关注与之相关的投入产出。二是不同行业反映不同，要支持受利行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减少受损行业损失。三是与社会发展相关的产业将可能有更大的机会，要关心公共管理、关心社会保障，关心健康事业、教育和文化等。

张国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水平很低，不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到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而要看质量，看它对劳动就业的带动作用。目前，受“非典”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低就业能力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就业质量和社会保障，政府要在帮助他们上多下工夫。

政府应善于总结经验。防治“非典”的公共性很强，政府现在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改正原来的错误、是找不足，由于最初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够，造成了一定的恐慌。甚至很多消息是国外先知道，然后传到国内。这样不利于树立政府的形象和恢复公民对政府的信心，要扭转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有观点认为“非典”的出现有助于抑制年初经济过热的情况，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正常的调整抑制和“非典”带来经济减速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不能混淆。

任若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关于“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我从两个角度做了定量分析：一是GDP的支出结构分析。分析出口威胁，因为对GDP的分析最终要看进出口差额，从一季度的统计数字来看影响结果不是很大；另外从投资来看影响也不大；最后真正可能产生影响的主要在消费上，即使增长率减少2个百分点，考虑其他促进因素的综合，GDP的下降估计不超过0.5%。二是GDP的产业结构和区域上的分析。分析影响较重的旅游、餐饮等部分三产产业，但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方式采用增加值收入法，旅游业的收入增加值只占全国GDP的千分之几，因此影响较小，大约只有10%的GDP受到影响，按去年计算综合考虑GDP下降应在0.5% - 0.8%之间。一季度增长至少是9%以上，考虑

“非典”因素的负面影响，现在来看很有可能在8.5%到9%之间的。

从定性角度看这是一次对经济局部的、临时性的冲击，从长期看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趋势。因为从劳动力、资源、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分析，“非典”没有损坏任何生产能力。但有两点值得观察，一是800万农民工返乡的问题。至少要影响两个月的收入，而且这是一种长期效应，会导致消费的变化，但从整体上估计影响不会太高；二是根据历史上类似事件的经验分析，疫情过后往往会有经济潜在增长力的回归。

邹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非典”的突发，人们首先会想到对经济现状的影响，这是大题目，我想了个小题目，就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水资源规划的挑战。

“非典”发生以后，人们洗手的次数变多了和时间变长了，从三、五次到一二十次，从六、七秒到二三十秒，还有洗澡次数和时间也相应变化了，洗车的时间、冲地面的时间增加了，由此带来了用水的问题。在“非典”高峰期，小餐馆100%关门，大餐馆损失了80%的客源，汽车减少了2/3以上，洗浴业几乎100%关门，游泳也100%萧条，在这个情况下，据有关信息，北京市的用水量上升了50%。过去人们总是根据经济增长水平来测算GDP水平和用水水平的相关系数，在水供应量和水需求量发生巨大变化情况

下马上带来了水供应和 GDP 关系变化的新数据。水供应稳定不变，但是消费量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用水和家庭消费需求的变化，用水水费大幅度提高。而且公共卫生突变，对现有的供水系统、对原有用水规划提出挑战，对现有排水系统也提出挑战。水需求指数随人们健康指数、健康质量发生了变化了，水需求的剧增引起财政补贴的变化。水供应和需求发生变化以后，引起政府对水供应量和需求量的重新测算，对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要重新设计，对每个家庭消费比例和消费构成的系数要重新测算，这些问题好像还没有提到议事议程上来，看似小问题，却影响一系列问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作为新问题研究规划，小问题大运作一下。

成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总的来看，“非典”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是局部、短期的。局部的可以理解，因为只在某些地区发生；短期的从广东的情况看，“非典”从暴发、波动、缓和到平稳的周期在3个月到6个月，按照流行病学的规律也是如此。至于是否会有反复，则是另外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五个重要因素没有改变：1. 政治稳定，这一点最重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对政治环境最为稳定的国家。2. 经济连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每年基本在7%以上，外贸则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3. 有潜在的广阔的市场，人口众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后，其消费总量相当大；4. 有廉价和优质的劳动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劳动力在教育背景、劳动技能等方面有优势；5. 这几年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有不小进步，国债投入很大的力量进行公用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入WTO后软环境确实有所改善。总

之，这五个优势基本没有因“非典”而改变，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变，因此我们还有足够的信心。

问题是从长期看，怎么把影响限制在短期和局部上，不让坏事继续发展。一是要讲究GDP增长的质量，二是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回避。中国在国际上吸收外资比较多，我们的优势在于政治稳定、潜在市场大、劳动力比较便宜。我们这些基本的优势还是要维持住，争取国际信任，才能把“非典”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坏事变好事有个前提，你要有条件，要采取措施，你要不努力，坏事不能自动变好事，总是说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真正做到这一点，就是要不回避并且真正解决问题。 ■

本文作者：民建中央调研部
责任编辑：王云峰

★ 数据库 ★

“非典”给企业带来的主要问题

(%)

	总体	地区					规模			经济类型	
		北京	广东	华东其他	东部其他	中、西部其他	大型	中型	小型	国有	非国有
商务谈判交流活动明显减少	78.3	77.3	74.4	74.3	81.7	76.7	81.4	78.5	77.7	82.2	76.5
原材料不能正常供应到位	22.1	27.3	17.9	24.8	19.9	22.6	21.2	22.0	21.8	20.4	23.1
企业产品（服务）销售渠道受阻	58.5	63.6	61.5	56.6	53.1	63.3	61.0	56.9	61.4	58.9	57.8
相关部门正常服务业务受限	37.4	36.4	33.3	41.6	30.9	43.8	42.4	34.7	39.1	43.3	33.5
企业严格防范措施影响效率	26.7	25.8	15.4	27.4	25.4	29.7	34.7	27.4	21.8	28.0	26.1
员工心理恐慌	7.7	9.1	15.4	4.4	9.0	6.4	8.5	7.5	9.1	7.3	7.8
对未来形势发展难以判断影响决策	24.9	24.2	33.3	17.7	30.5	20.8	21.2	26.1	25.5	26.9	24.5
其他	3.7	3.0	7.7	4.4	3.9	2.8	3.4	3.9	4.1	2.5	4.3

数据来源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6月12日公布的《“非典”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千户企业问卷调查报告》